

《黔書》的治書框架與西南審美經驗

胡曉真*

摘要

明清時期描述西南地區的文本有一個共同的特色，即歷史、傳說、見聞與想像虛構在同一話語體系中互參互證，又彼此競逐，形成一個「西南知識系統」。本文以清初貴州巡撫田雯（1635-1704）編撰之《黔書》為例，討論知識傳播與文學審美兩種價值，在志書／治書的文類規範中如何互動與衝撞。同時，本文也將《黔書》置於田雯整體的書寫脈絡中，與作者詩文集中其他作品比較，以發掘其間隱藏的矛盾、掩飾、焦慮甚至仇恨等種種雜音，並就此進行解讀。田雯寫作追求繁富、講究鍛鍊、癖好新奇，其風格與治書框架因矛盾而對話，使得《黔書》在眾多西南敘事文本中有突出的文學價值。

關鍵詞：田雯、《黔書》、《古歡堂集》、西南

*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

一、前言

西南地方的歷史、人文與民族特色，在中國歷代官方志書以及文人筆記中留下很多紀錄，這些文字往往透露中央政教、儒家思想與漢民族文化接觸他者時的眼神、以及回向自我的餘光。¹ 相對來說，虛構敘事的長篇小說就西南地方題材大幅發揮的例子，則屈指可數，而其中表現的文化接觸以及世界觀的扭轉，又自有寓意的深度，展開了小說容攝多音的特性。² 與西南地區有關的文本，不論其文類歸屬為史、為志、為記，或小說，都展現一個共同的特色，亦即歷史、傳說、見聞與想像虛構在同一話語體系中互參互證，又彼此競逐，形成一個「西南知識系統」。故而這些文本雖似乎對西南文化的看法趨向一致，且在文字層次上出現許多重疊，但細膩的分析卻能展開時代、文類、個別文本與作者之間絲縷糾結的關係。在本文中，我將試著分析文類屬性不統一的著作，具體分析其敘寫黔地的方式，從而挑戰僵硬的文類觀，反思文本的多義可能。

本文處理的文本，乃是由理黔大員田雯撰作，成書於康熙年間的《黔書》。田雯是清初政聲卓著的能臣，《黔書》的形式，初看表面則是以治黔手冊為名的官員筆記，可稱為一部「治書」，廣義來看，也可視為「志書」之一種。然而若細審之，不難發現作者衝撞、模糊了他所採取之寫作形式的規範，挑戰了讀者的期待。志書原來並無定

¹ 之前曾觸及相關議題之研究，如胡曉真，〈旅行、獵奇與考古——《滇黔土司婚禮記》中的禮學世界〉，《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29 期（2006 年 09 月），頁 47-83；民族學專業的討論可參見王鵬惠，〈漢人的異己想像與再現：明清時期滇黔類民族誌書寫的分析〉，《考古人類學刊》58 期（2002 年 06 月），頁 146-192。另外，范宜如則以明代王士性為例做過一系列討論。

² 例如，長篇白話小說《野叟曝言》中有若干回描寫廣西苗峒，文言小說《蟬史》則描寫清政府與西南民族的戰爭。參見胡曉真，〈華夏忠臣遭遇邊域保蟲——《蟬史》與《野叟曝言》中的西南書寫〉，《中國文學學報》第 2 期（2011 年 12 月），頁 231-256。

體，但大致應有關於地方歷史、地理、制度、經濟以及文獻等實用資料的纂輯或撰述。可以說，《黔書》包裝為治書，卻瀟灑著審美的想像，透露作者在統治教化與文人趣味之間的游移。此類漢族文人對西南地方文化與民族的描寫，率皆以己視他，文化的偏見處處可見，幾一無例外，近年來的學術研究已做了許多反思，因此筆者不打算在此問題上著墨過多。本文討論的重點，將放在作者、文本與文類三者交會的火花之上，探索知識與美感在西南書寫中的經緯交織。

二、治世之書？名都之賦？——《黔書》的雙重面目

歷代關於西南地方的著述，官方志書而外，出於派任到當地的官員之手的不少。如唐代樊綽的《蠻書》、元代李京的《雲南志略》、明代田汝成（1503-1557）的《炎徼紀聞》等等，作者都曾在西南為官，以個人見聞與地方傳說匯集發揮而成書，而且由於他們具有官員身分，故對於中央政府如何「綏靖」地理上遠離政治中心之地區，地方官員又如何因地制宜地「鎮撫」文化習俗不同的人民等問題，往往特別關注。田汝成在《炎徼紀聞·序》中所說便有相當代表性：

炎徼之政，少催科獄政之擾，其卒然隳突、驚心駭目者多夷情，而夷情之尤掣肘者，在乎土酋獷悍，抗敗王略，效尤惡習，逆節比起，法令格闕而不行，駸駸乎尾大不掉之患。雖欲羈靡，漸不可得。以治理論，中原易而遠方難。近之可憂，未若遠之可憂也。……譬諸一身，中原，心腹也，遠方，四肢也。四肢有疾，而委之庸醫，善攝生者，固如是乎？……自余涉炎徼，而所聞若干，事皆起於撫綏闕狀，賞罰無章。……卒致干戈相尋，蔓然荼毒，下竭生民之膏血，上貽廷議之軫憂，良可嘆也。……夫公之有取於是書者，豈直以文字之華哉！無乃以其

有關於政紀也。³

田汝成以身體與疾病為喻，突顯了西南地區對明政府而言的邊陲性（四肢）與危險性（有疾），這是由統治者的立場發言，顯而易見。值得注意的是，田汝成把療疾的責任，歸於派任於此的官員，是否能止戰戒殺，和平統治，全賴官員的作為。正因如此，田汝成必須強調自己作品關乎政紀，可資未來官員統治參考的實用價值。其實，田汝成是一位極擅長敘事的作者，他講的故事結構井然，有邏輯，有細節，⁴《炎徼紀聞》的可讀性高，原因即在此，然而他卻忙不迭地迴避自己作品的文學性，撇清「文字之華」的特色。田汝成的例子，大體說明了身為地方官員的作者在敘寫邊域地區時，為自己定位的發言位置——質必須勝於文，實用價值應該高於文字經營。這樣的自我定位，在清代康熙年間貴州巡撫田雯的作品《黔書》中進一步發酵，然而，不同的是，田雯的文學興味往往高張，而與「治書」框架產生緊張關係，這便是筆者特別留意之處。

田雯（1635-1704）是康熙朝重要的官員，字子綸，一作紫綸，一字綸霞，號山蘊子，晚號蒙齋，山東德州人。康熙三年（1664）進士。康熙十九年提督江南學政，康熙二十六年（1687）授貴州巡撫，康熙三十年因丁母憂去職。在黔三年，時間雖短，但頗有政聲。據清史紀錄，他在任內不以征剿為事，⁵ 而是整頓吏治、獎勵農桑，並致

³ [明]田汝成，《炎徼紀聞·原序》，收入《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3979冊，頁1。

⁴ 例如，田汝成敘述明初貴州水西女土司奢香與明太祖交涉的故事，趣味橫生，堪稱各家版本之冠。相關討論可參見胡曉真，〈前には奢香有り後には良玉——明代西南女土司の女性民族英雄、構築されるそのイメージ〉，木下雅弘譯，《中國文學報》第78冊（2009年10月），頁54-90。有關田汝成的戰爭敘事的分析，參見胡曉真，〈炎徼與我杭——田汝成的地方聞見〉，收入林政儀主編，《文學經典的傳播與詮釋》（台北：中央研究院，2013年），即將出版。

⁵ 據《清史稿》，田雯初到任時碰到苗民反抗，兩廣總督傾向會剿，但田雯則主張：「制苗之

力於教育事業，推動文化建設，包括重修甲秀樓、諸葛亮祠、王守仁祠，還修葺龍場書院等等，因此受到當地人民的愛戴。⁶ 在今天，對非清詩學者而言，田雯可能並不特別受到注目，但在清初時期，他其實是一位非常知名的詩人，與詩壇領袖人物都有往來，著有《古歡堂集》、《黔書》、《長河志籍考》等。⁷ 鄭方坤在《本朝名家詩鈔小傳》中，提出田雯「享盛名四十年，從游半天下」，且「壇坫之盛，幾與漁洋埒」，⁸ 而錢鍾書《談藝錄》也說田山蘊是漁洋之外的山左另一名家。⁹ 紀昀編《四庫》，在《古歡堂集》的〈提要〉中指出，田雯與同代且同鄉的王士禛「不相辨難，亦不相接納」。在貴州還流傳著田雯與周漁璜（1665-1714，著名貴州學者）忘年論交的佳話，貴為巡撫的田雯賞識當時還不到而立之年的周漁璜，相與論詩，後來還為周漁璜的《稼雨軒詩集》寫序。田雯的政治生涯雖然也很精彩，但他始終未曾放棄詩人的自我認同，這便深深影響了《黔書》的寫作風格。

《四庫全書》收了田雯的《古歡堂集》，紀昀在提要中引用王士

法，犯則制之，否則防之而已，無庸動眾勞民。」〔清〕趙爾巽等，《清史稿》（台北：明文書局，1985年），卷四百八十四，列傳二百七十一，文苑一，頁13330。

⁶ 田雯生平及其政治經歷，見趙爾巽等，《清史稿》，同前註。另可參考田雯自撰之《蒙齋年譜》與《續年譜》，收入劉聿鑫編，《馮惟敏、馮溥、李之芳、田雯、張篤慶、郝懿行、王懿榮年譜》（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86-112；以及田貴寶，〈清初著名文學家——田雯〉，《德城文史》第16輯（1999年8月），頁107-143。

⁷ 關於田雯的文學成就，可參見李景華，〈清初詩壇和詩人田雯〉，《首都師範大學學報》1994年第2期，頁13-20；黃金元，〈清初山左詩人田雯及其詩歌創作〉，《東岳論叢》2004年第5期，頁119-122。又，前幾年已出現了以田雯之文學成就為主題的學位論文，並及田雯的交游狀況，參見張銀娜，《田雯研究》（蘭州：蘭州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學科碩士論文，2007年）。

⁸ 鄭方坤，〈古歡堂詩鈔小傳〉，《本朝名家詩鈔小傳》（台北：明文書局，1985年），第24冊，頁199-202。鄭方坤又在此比較王漁洋與田雯的風格，稱「漁洋披一品袍，抱九僊骨，能於屏風上立，薰籠上行，固是李鄴侯一種標格；山則如鄭伯猷之嘆崔，身長八尺，面如刻畫，聲欸作洪鐘響，胸中貯千卷書，令人不得不驚絕也。」

⁹ 錢鍾書，《談藝錄》（香港：龍門書局，1965年），頁129。

禎（1634-1711）為《黔書》所作〈跋〉的說法，對《黔書》下了這樣的評價：

王士禎《居易錄》嘗稱《黔書》篇不一格，有似《考工記》者，有似《公》、《穀》、《檀弓》者，有似《越絕書》者，如觀偃師化人之戲。然與《長河志籍考》，實皆祖郭憲《洞冥記》、王嘉《拾遺記》之體，是亦好奇之一證。¹⁰

王士禎「篇不一格」的說法，指出他閱讀《黔書》時，因其文類屬性不統一而產生的不安感。既有《公羊》、《穀梁》的經傳注解體，又有如《考工記》般對工匠工藝的紀錄，有時又寫得像《越絕書》那樣的地域性歷史，這種屬性變化不一的寫作方式，王士禎比喻為《列子》中偃師技藝之巧，化人道術之奇。然而這個比喻雖似形容田雯寫作技巧之高超驚人，卻又暗指文體不一而造成的虛幻不實的感覺。紀昀便掌握了這一點，直接把田雯寫《黔書》的立意，定為好異愛奇的心理，歸屬於志怪一類。而且，紀昀觀察到這是田雯一貫的書寫策略，不但寫遠在西南的貴州如此，寫自己家鄉德州風土的《長河志籍考》亦復如是。¹¹ 換言之，由當時讀者如王士禎或後代讀者如紀昀的角度看來，讀《黔書》不能拘泥核實，還須考慮其文學想像與文章筆法。

為《黔書》作序的徐嘉炎（1631-1703）也注意到這個現象，但他以作序者的立場發言，有義務更積極地解釋田雯的寫作方式。徐嘉

¹⁰ 見〔清〕紀昀，〈古歡堂集提要〉，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七，別集類六（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第1324冊，頁2。

¹¹ 紀昀的看法如此。事實上，田雯所編寫的《長河志籍考》，全書十卷，多考山川地理，風俗廟觀，只有第十卷涉及奇人異士。不過，雖是考稽之作，但田雯不但常插入自己的詩作或引述他人的詩作，而且行文特別注重文采，華麗幾如辭賦。這部書以美感的文字表現實際的知識，由這個觀點來看，也可說是篇不一格，與《黔書》比肩。關於田雯這一兼容美感與知識的風格，下文將繼續討論。參見田雯，《長河志籍考》，收入《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3143、3144冊。

炎自己是讀書過目不忘的才士，康熙十八年（1679）召試博學鴻詞科，後官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亦是康熙朝的大員。他與西南地方也有一層緣分，康熙廿年平定滇黔，在朝臣一片制式的頌詞中，徐嘉炎別出新裁，模仿饒歌鼓吹曲的體制，撰聖人出至文德舞二十四章，得到皇帝特別的賞識。康熙二十九年，徐嘉炎出任貴州鄉試正考官，¹² 當時田雯還在貴州，大概有此因緣，後來才受邀為《黔書》寫序。徐嘉炎在序中反覆申述《黔書》在治術與文采之間的擺盪。他首先比較了體裁純粹的兩類著作：

嘗考讀古今輿圖疆理之書，所載山川之隆窪，財賦之豐嗇，與夫士馬、甲兵、人材、風俗之備詳，誠有資於治術矣，而文采則不足。及觀歷代詞人才子，賦名都，言井里，擷蟲魚草木之華，多宮闕城郭之盛，極其偉麗矣，至於攬景物之蕭條，感變聲之哀颯，亦復淒涼悲慨，嚼徵含商，然以語於治之得失，民之休戚，則概未之及也。蓋著述之不能相兼如此。¹³

徐嘉炎文中所謂「輿圖疆理之書」，指的是方志學分類中相對於「歷史派」的「地理派」¹⁴；所說「有資於治術」，即是對「志書」作為「治書」的實用性要求，講求的是考稽地理，分析財賦，統計士馬與甲兵，描述人材及風俗。舉極端的例子，我們只要一覽明代官修的貴州方志，如弘治《貴州圖經新志》、嘉靖《貴州通志》及萬曆《貴州通志》¹⁵，即可知一部以有資治術的資訊為中心的志書，雖分建置沿革、形

¹² 徐嘉炎生平見趙爾巽等修，《清史稿·文苑傳》，《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卷484，列傳271，頁13344-13345。

¹³ 〔清〕徐嘉炎，〈序〉，見田雯，《黔書》，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貴州府縣志輯》（成都：巴蜀書社，2006年，民國《黔南叢書》據嘉慶十三年刻本重排鉛印本），第3冊，頁465。

¹⁴ 歷史派將方志視為一種史書的書寫，時亦及於論斷；地理派則以方志為地理書，淵源於《禹貢》、《周禮·職方》。說見巴兆祥，《方志學新詮》（上海：學林出版社，2004年），頁89-95。

¹⁵ 弘治年間的《貴州圖經新志》及萬曆年間的《貴州通志》二志皆以行政區的宣慰司、府、

勝、風俗、山川、土產、學校、書院、寺觀等項目，但通篇皆陳陳條列，重在資料價值，而非文章價值，最多不過選錄若干題詠之作。相對的，所謂名都之賦，在徐嘉炎看來雖然描寫華美，寄情于景，卻無益於治道。徐嘉炎對地理之書欠文采，詞人之文乏經濟，言下之意似乎頗覺遺憾，但這正是為了鋪陳而突顯田雯著作「兼美」的特色：

先生之書，蓋專為治黔者法也。……先生以英偉之才，深沈之識，身處其地，知之審、慮之周矣，故其為書，於所以致治而防亂者，三致意焉。……雖然，先生之為是書，又不獨以經濟自負也，蓋其英偉之才，深沈之識，具雄奇而擅奧博者，又實為詞人學士之宗。凡黔之草木、山川、人材、土物，皆幸有先生，以發其菁英而抒其藻麗。是故椎巖刻木，皆可入王會之圖也；踏月吹笙，皆可作名都之賦也。飛雲白水之瀑，可以媲美於台廬也；濟火關索之名，可以核實於紀載也。牡丹之花，並於洛陽，渥洼之產，雄於冀北，以及丹砂、卉革、砮礮、雄黃之屬，皆豔稱而悉數之，使人之視黔，以為名邦，以為樂土，慕而安之，美而賦之。……後之讀是書者，既賴以治黔，而又資其餘材，以考據史傳，乞靈詞賦。……嘉炎來黔，受其書而讀之，不禁快然曰：是書也，經濟、文章，任人之攜取而各得，

衛為次序，其下再依建置、風俗等項目分敘之，是《大明一統志》的體例。嘉靖年間的《貴州通志》則接近類書體制，先分為地圖、建置沿革、星野、疆域、風俗、土產、財賦、職官、學校、歲貢、寺觀、名宦、人物、藝文等類別，再按司、府、州、衛依此敘述。參見〔明〕沈庠修、趙瓚纂，《貴州圖經新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貴州府縣志輯》（成都：巴蜀書社，2006年，弘治刻本，貴州省圖書館影寫曬印本），第1冊；〔明〕謝東山修、張道纂，《〔嘉靖〕貴州通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貴州府縣志輯》（成都：巴蜀書社，2006年，1982年貴州省圖書館據雲南大理借雲南省圖書館傳鈔天一閣藏嘉靖刻本重鈔本複印本），第1冊；〔明〕王耒賢、許一德纂修，《〔萬曆〕貴州通志》，收入《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年，據日本尊經閣文庫藏明萬曆二十五年刻本影印）。

所謂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者也。蓋著述之兼美，莫踰於此矣。¹⁶

徐嘉炎文中所述，可說概括了《黔書》所有的主題。在治術的一端，稱美田雯重教化，興學校，勵科舉的種種政策；在文采的一端，歷數田雯描寫的習俗、山水、物產。值得注意的是，由序文的語氣與細節來看，徐嘉炎雖然盛讚《黔書》之兼美，其實對這文本的不純粹與不穩定，仍是隱然不安的。特別是同樣身為地方官員，他其實還是以治術為重，所以開宗明義的指出此書乃「專為治黔者法」，強調田雯防亂而非鎮壓的統治原則，更將田雯的藻麗文字，引申為使人愛慕斯土的政治目的性書寫，彷彿若非如此，便不能為一個地方大員沈溺於發揮文采做辯護。如此，自王士禛、徐嘉炎到紀昀，不論其態度之正反，都留意到《黔書》表現了作者洋溢——甚至可說是泛濫——的文學趣味。這種對文采的執著，被認為不甚適宜作為寫作治理之書的官員。

以下，我們不妨直接檢視《黔書》中經濟與文章究竟如何揉雜，而作者的文字經營與文學想像又表現了什麼。

三、纂組成文——《黔書》寫作策略的織錦法

《黔書》版本有二卷本與四卷本，¹⁷ 本文引述則採用刊刻較早的二卷本。全書前半部錄歷史、苗民部落種類、風俗、方言、民生（如穀、鹽、火）、山川地理景觀；後半部錄人物、歷史遺跡、物產、傳說。大致說來，前半較集中地提供知識與資訊，討論治黔之術，而後

¹⁶ 同前註。

¹⁷ 二卷本如民國《黔南叢書》據嘉慶十三年刻本重排鉛印者，《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所收亦是二卷本，不過《四庫》本只錄了一條評者丁焯的評語。四卷本為咸豐伍崇曜校勘《粵雅堂叢書》所收，《叢書集成初編》即據此版排印。筆者引用使用二卷本的《黔南叢書》排印本，輔以四卷本。

半較多文學表現。首篇〈綏建〉，綜述貴州自元以來以貴州為名之後的歷史，再論貴州之難以治理，與其對中國而言不得不治的戰略意義。〈改隸〉篇論貴州自古以來之政治隸屬沿革。〈設科〉篇論貴州自明代始有生儒就試，這正是明政府以教化為統治的影響，田雯顯然認同此一策略，且強調：「我國家定黔以來，興賢造士，設科者七，闢門之典，視昔加盛矣」。¹⁸ 篇後附有田雯到任後上奏的「請建學疏」，該奏文建議朝廷在貴州增設學校，並方便應考的學子，不必迢迢千里赴武昌，而可就近在貴陽應試。這是田雯就任貴州巡撫後所上的第一份奏文，代表他治黔的最高原則，也被認為是他最大的政績。〈定黔〉篇回頭敘述明末流寇張獻忠的軍師孫可望占領貴州，一直到投降的過程。上述幾篇安排在全書開頭，必非偶然，可視為作者展示他作為地方官，對地方歷史如何理解，對地方發展如何規劃，簡單的說，便是證明自己是個有遠見、有能力的好官。

之後，我們便讀到〈苗蠻種類部落〉一篇。此篇羅列漢人知識系統中所認知的當地非漢民族，乃是西南紀錄中必備的書寫品項，也是身為地方官不可不做的功課。田雯說：「黔僻處西南，窮山深箐所在，無非苗蠻，其種類各殊，而部落亦不一矣。」¹⁹ 於是歷數盧鹿（水西羅鬼）、狝家、生苗（九股苗、紫姜苗、黑苗、紅苗等）、宋、蔡等數十種。嚴格說來，田雯所述，與明清時期各種西南紀錄出入並不大。比較特別的是，田雯還一一註明該部落轄於何土司，這是因為他認為貴州之難治，與土司有很大關係，所謂：「若此者，世其土即世其民，蟬聯而蔓延，爭奪而戰攻。苗蠻之患，率釀於土司，自昔然也。」²⁰ 這樣的思考方式，實與從明代到清代輪廓越形清晰的改土歸流政策密切相關。

¹⁸ 田雯，《黔書》，頁471。

¹⁹ 同前註，頁474。

²⁰ 同前註，頁475。

在〈苗蠻種類部落〉篇中，田雯還大致維持地方官的治理者身段與面具，但到了下一篇〈苗俗〉，他的文人性氣便似遏抑不住了。本來描寫其他民族，最易洩露自己的文化偏見，我們何能指望十七世紀的田雯是例外？確然，在〈苗俗〉一篇中，有後見之明的我們很容易偵測到殖民者的偏見與不見。例如，提到最大族群羅施，便公然說：「即問從來，亦稱鬼國，長身黑面，依然豺虎之倫」。²¹ 鬼怪或禽獸，總是非我，類似這樣的敘述在諸多關於邊域或異國的紀錄中早已自成譜系，坐實了漢族中心主義的罪狀，《黔書》不免亦在其列。不過，在本文中我不欲追蹤田雯作為殖民者與治理者的眼光，而要反過來看他作為文人的心靈，如何與治理者的身分發生互動。且看〈苗俗〉開頭作者的夫子自道：

十年幼學，曾披山海之經；蚤歲登朝，親與享王之會。以云觀記，未若今茲離城十里之區，便是三苗之種。既無姓氏之譜系，孰察其詳，賴有父老之流傳，嘗聞其略。²²

田雯先自招認了自己與異文化的隔閡。讀過《山海經》之類的典籍，不過習得一些典故；參與了朝貢的儀式，不過見識幾個異民族的代表。唯有就任貴州，讓田雯有機會用自己的眼，自己的耳，重新認識陌生人。而且，正是因為文字資料匱乏（無姓氏譜系），迫使他放棄倚賴書本，而與當地人士對話。然而有趣的是，取得了近身耳聞目見的第一手資料後，田雯卻不以治理者的聲音傳述其見聞，以供後之治者參考，反而轉以藻飾的駢文文體描述他眼中的各部苗俗。當然，不少文句透露他接觸差異文化的驚詫感，例如「茹毛飲血，蠕動之物咸嘗」，自註「白獾」，可以想見他看見或聽聞白獾族把蟲類列入菜單時的訝異、不適與排斥。但更常見的則是作者對細節的追求，以及沈浸

²¹ 同前註。

²² 同前註。

在細節的觀察與細節的表現中的愉悅。例如這一段：

持斧林間翻拾椽，驅牛坂上且高眠。醉鼓諸葛之銅，釀金賽社
諸葛銅鼓，蠻人寶之，冷吹媧皇之管，連袂踏歌編竹為蘆笙以跳月。短裙纔
至胛，難拖六幅瀟湘，窄裋僅齊腰，豈識五銖霧縠。然而盤絲
繪蠟，亦自可人繡花於布，或以蠟畫花，抹粉塗朱，常多憐己臨水自照，
銀環雙婀娜，酷似簾鉤大而且長，鬢髮一蒙茸，全資馬鬣以馬鬣雜髮
為髮而戴之。²³

這一段無疑將目光集中在陌生感與美感交織的景象上，民間節慶的儀式與音聲，女性的衣服與裝飾，構成田雯排偶文字中的感官世界。這是影像與聲音的審美文本，而不能僅就其資料性，當作地方志、民族志或治書來讀。誠然，作者獵異好奇的文人心理是顯而易見的，正如這段駢文的結語所說：

欲寫鬼方之變相，難賡鉛素以搜求，聊為雜俎之詞，用發掀髯
之樂。²⁴

雖然中國早有描繪遐邊民族的職貢圖，但《皇清職貢圖》要等到乾隆朝才編纂，黔苗圖說之類以西南地方民族為描畫對象的圖像，此時也尚未出現，故田雯對圖畫丹青止於嚮往，而專注於文字。「掀髯之樂」一語，容易引起現代讀者批判性的反感，不過我以為此樂應解作（以民族特異性為素材的）寫作、閱讀與望文生義的想像之樂，即所謂「變相」——不同於儒家漢文明的文化表現，而非譏諷批評之樂。所謂「好奇」，不應只作「出於文化偏見的獵奇」來解釋，而更應思考這是一種驅動文人開放自我並試圖理解異質與他者的力量，筆者當有他文論之。當然，我們也不免注意到，這位致力於教化，而又充滿文學興趣

²³ 同前註，頁 475-476。

²⁴ 同前註，頁 476。

的地方大員，對女性美投以玩賞的眼光與表現的企圖。這個特點在以下的討論中還會浮現。

恣縱於駢文的美感經營之後，作者又拉回了傳統志書的軌道，以平實的散文分述花苗、東苗西苗、牯羊苗、青苗、白苗、谷蘭苗、平伐司苗、九股黑苗、紫姜苗、短裙苗、禾苗、生苗紅苗、陽洞羅漢苗、黑羅羅、八番、白羅羅、打牙狃猪、剪頭狃猪、木老、狃家、狗耳龍家、馬鐙龍家、宋家、蔡家、土人、狃獍、蠻人、楊保、熨人、峒人各部之風俗。事實上，正如多數西南地區的紀錄往往一再轉抄，《黔書》在〈苗俗〉部分也抄錄傳統民族志書寫，如描寫黑羅羅，自明以來都引用田汝成《炎徼紀聞》中的說法，田雯亦是如此，所謂：「蜀漢時有濟火者，從丞相亮破孟獲有功，後封羅甸國王，即安氏遠祖也。羅羅之俗，愚而戀主，即虐之至死，猶舉其子姓若妻妾戴之，不敢貳，故自濟火以來，千有餘年，世長其土。……諺云，水西羅鬼，斷頭掉尾，言其多且強也。」云云，²⁵ 皆襲自《炎徼紀聞》²⁶。許多對特定族群或淳樸、或強悍、或戇直、或嗜殺的概括性斷語，也一再重複。在這裏田雯顯然並不在意現代意義的創作，而安於資訊纂輯的志書作者的身分。不過，即使如此，田雯的美感眼睛仍然發生作用，觀察到他人或不以為意的形貌細節。例如，在寫花苗時，田雯注意到蠟染的技術，並附會為花苗的名稱由來：

裳服先用蠟繪花於布，而後染之。既染，去蠟，則花見。²⁷

乾隆《貴州通志》介紹花苗的蠟染，文字完全相同，顯然抄自《黔書》。

²⁸ 田雯對蠟染的敘述，雖然只是點到為止，但卻不只是技術的介紹，

²⁵ 同前註，頁 478。

²⁶ 田汝成對「水西羅鬼」的描述可見《炎徼紀聞》，頁 57。

²⁷ 田雯，《黔書》，頁 476。

²⁸ 〔清〕鄂爾泰等修，《貴州通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貴州府縣志輯》（成都：巴蜀書

而是透露他留意美感細節的傾向。又如關於狝家，田雯大致抄錄了《炎徼紀聞》描寫的婦女衣飾：

以青布蒙髻，若帽絮之狀，長裙褶積，多者二十餘幅，拖腰以綵布一幅若綬，仍以青布襲之。²⁹

但又加上了自己的一句註腳：「婦人多織好而勤於織。」洩露了眼光流連的所在。寫到狝家也有跳月習俗，田雯又注意到微小的細節：「亦於孟春跳月，用綵巾編為小圓毬，如瓜，謂之花毬，視歡者擲之。」³⁰ 對跳月的描寫，自楊慎《滇程記》³¹ 以來，遊歷西南的文人各顯神通，其中描繪得最栩栩動人的當推陸次雲的〈跳月記〉³²。然而，田雯特別觀察到跳月的小道具，又由極細微處突出了顏色、動作的花俏。真可說，田雯對塑造畫面的美感，實在相當執著。《黔書》的評註者丁煒³³ 這麼評論：「一經一緯，合纂組以成文，殊俗殊方，閱湘縑如指掌。荆楚歲時之記，無此雅馴；齊諧誌怪之書，遜茲詭異。豈為談苑先資，實為職方纂要。字當千絹，讀宜百迴。」³⁴ 丁煒是一位非常稱職的評者，他把《黔書》的寫作比喻為織品，筆者以為頗為精當，捕捉了此書中不同寫作模式的交匯。我們或可借用丁煒的評語，形容田雯將自己的文學美感，錯織於方志語言之中。

在以下的各個篇章中，田雯繼續使用類似的織錦法，將前人的筆

社，2006年，乾隆六年刻嘉慶修補本），第4冊，頁121。

²⁹ 同時參見田汝成，《炎徼紀聞》，頁58-59；田雯，《黔書》，頁479。又，乾隆《貴州通志》亦襲之，見《貴州通志》，頁120。

³⁰ 田雯，《黔書》，頁479。

³¹ 〔明〕楊慎，《滇程記》，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127冊（台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年），頁672。

³² 〔清〕陸次雲，〈跳月記〉，《北墅緒言》，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237冊（台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頁357-358。

³³ 〔清〕丁煒（1627-1696），著有《問山詩集》、《問山文集》等。

³⁴ 見田雯，《黔書》，頁481。

記、方志，與自己的評論及文學創作混雜在一起。而清楚意識到田雯「織錦法」的丁燾，其評論也往往能與田雯文本進行或補白、或加強的對話，使織錦更為繁複。例如，田雯以駢文寫〈黔風〉，對黔地的迎春風俗津津樂道，他先舉出前代《荊楚歲時記》、《東京夢華錄》等作品對民間的剪綵紙、杖春牛之類的立春習俗皆有所描寫，然後轉而敘述黔地風俗：

率土攸同，黔風可紀。朱樓畫戟，高低陣馬風檣；玉貌繡衣，千百番童熨女。蘆笙六孔，吹諧宮徵之音；社鼓三通，人作鸛鶴之舞。駝頭鳳腦，制自苗村；鶴焰鰲山，擎來木老。火樹星橋之下，九陌喧闐；木瓜金筑之間，百蠻粧束。³⁵

在此，作者將具有西南地區特色的詞彙大量植入，有象有音，從而營造特殊的地域風情。然後其筆鋒一轉，換上了官員的聲口：

於焉卜歲，實為豐年；藉此觀風，豈非樂土！……鬪雞蹴鞠，不比齊風楚風；跳月斫牛，何嫌鬼國羅國。化行俗美，因革莫拂乎人情；鑿井耕田，昇平總歸於帝力。爰記一時之盛，聊當太史之陳。³⁶

能卜豐年，又居樂土，既化民風，又勵農耕，那麼，雖然全文公然歸結到一句「昇平總歸於帝力」，但潛台詞當然是地方官員能行善政。此文之後，再附上〈迎春詩〉長詩與〈春鐙絕句〉八首，細寫黔地迎春節慶的風情搖曳，這些都出於田雯本人的經驗、觀察與文學經營，而他以治黔為樂土自許的政治抱負，也掩映於民情風俗的描摹之下。但編排上緊接著的則是〈土官〉一篇，關懷的是戰爭與政治議題，但其正文其實並非田雯手筆。這篇文章的原始出處是明代高拱《靖夷紀

³⁵ 同前註，頁 482。

³⁶ 同前註。

事》，高拱以第一人稱「予、愚」敘述如何用政治智慧而非高壓手段，處理貴州土司安國亨安智仇殺叛逆一事。馮夢龍在《智囊》中依據《靖夷紀事》重述了這個故事，除改為第三人稱「高相、拱」敘事之外，文字大致相同。³⁷《黔書》抄錄的對象，究竟是《靖夷紀事》還是《智囊》？很難一語斷定。不過，《黔書》敘事當然採用第三人稱，因此除了開頭加上註明朝代的「明」字，其餘與馮夢龍《智囊》的敘事版本一模一樣。更可以確定的是，雖然身為方面大員，但田雯在正文後面的「論」中，指名道姓地引用了「馮猶龍」的評論！其「論」曰：

此事若如新舊撫臣所請，則西南之變，不待壬戌矣。幸新鄭獨持廟略，乃得無事，厥後西曰阿烏謎復挾安位以叛，功陷大方城，總督朱燮元走書撫之，述及前事，謎以詢故老，咸曰，信有之，乃練兵就撫，如出一轍也。吾因是而重有感矣。馮猶龍曰：「國家於土司，以戎索羈縻之耳，原與內地不同。彼世享富貴，無故思叛，理必不然。皆當事者，或腴削，或慢殘，或處置失當，激而成之，反尚可原，況未必反乎？如安國亨一事，若非新鄭力為主持，勢必用兵。竭數省之兵糧，以勝一自相仇殺之蠻人，甚無謂也。」馮子此言，蓋有感於壬戌之變也。安得不思新鄭為後世師哉！³⁸

田雯所引，與《智囊》評論的原文，只有微小的差異。這一方面可見其取材資源之廣，並不排斥小說家言，一方面則表現了田雯撫黔所遵循的原則。

但既然稱為治書，田雯也在《黔書》中呈現了他對當地經濟民生的觀察與思考，例如〈積穀〉、〈鹽價〉、〈襪火〉、〈救火〉等篇，都確

³⁷ 參見〔明〕馮夢龍，《智囊》「上智」篇「通簡」卷三〈高拱〉，收入《馮夢龍全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0冊，頁74-75。

³⁸ 田雯，《黔書》，頁483-484。

實出於田雯在當地致力解決社會與民生問題的經驗，而他也往往以「余之治黔也」的口氣發言，昭示自己的身份。事實上，雖然田雯的詩人認同強烈，但官員身份在《黔書》的彙纂工作中也發揮很大作用，二者之間的緊張關係形成《黔書》最大的特點。例如，汞是貴州重要的物產，在《黔書》中，田雯便詳細記敘了當地人提煉朱砂（主成分為汞）與水銀的方法，因為頗可呈現田雯的寫作風格，徵引如下：

朱砂——自馬蹄關至用砂壩，十里而近，自用壩至洋水熱水，五十里而遙，皆砂廠也。洋熱之砂，為箭鏃，為箇子。用壩之砂，為斧劈，為鏡面，此其凡也。采砂者必驗其影，見若匏壺者，見若竹節者，尾之，掘地而下曰井，平行而入曰壩，直而高者曰天平，墜而斜者曰牛吸水。皆必支木幕版以為廂，而後可障。土畚鍤錘斲斧鑿之用靡不備。焚膏而入，蛇行匍匐，如追叟子，控金頤而逐原鹿。夜以為旦，死生震壓之所不計也。石則斧之，過堅則煤之，必達而後止。有狻猊焉，象王焉，於菟長離焉，則大幸矣。否則栝菴焉，篔簹焉，簪珥焉。要亦聽之，龐而重者為砂寶，伏土中，啣啣作伏雌聲，聞者勿得驚，驚則他走。凡砂之走，響如松風，無巨無細，咸以晶瑩為上，柳子所謂色如芙蓉是也。方其負荷而出，投諸水，淘之汰之，搖以牀，漂以箕。既淨，囊而漉之。不即乾，口以吹之。其水或瀦之池，或引之竿。越崗踰嶺，涓涓天上落也。獲之多寡視虜命，地之啟閉視虜時，砂之楛良視虜質。不可強亦不可恆也。銅仁萬山，婺川板廠，皆有之。³⁹

砵礮——竈有大小，釜亦如之。大者容砂二十升，離而為十層，次入之間，以稭布陳汞灰於其上，治以杓，中凹而圍凸，覆

³⁹ 田雯，《黔書》，頁 526。

以釜，差殺之，揉鹽泥而塗其脣築之。乃煨之，凡一晝夜而汞成。滴滴懸珠，滉漾燿燦，皆升於覆釜之腹。小者以煎砂石相錯之巖子，既實之，掩以筠籠。籠如篩，塗以泥。豆其孔以疏氣者四，孔則周遭槽之穴。其上覆以小甃，亦鹽泥固之而後煨，炷蕪可成。汞登於甃，溢則注於孔之槽，俟其性定。挹而注諸豕脬，裹而縛之，乃可行遠。如或傾之，斂之以椒，聚集如故。啟釜甃者，必含蓋或鬻汁，乃可適，不則觸其氣而齒墮。已成汞而升之，復可為硃。不忘其本，物亦有然者矣。又有自然之汞生砂中，不待烹煉而成者，尤不易得，羽化之資糧也。⁴⁰

這可說是王士禛所稱《黔書》有似《考工記》的例證之一，具體顯示田雯作為官員如何關心地方物產之製造過程，可以視為技術性的文獻。然而，顯而易見的是，田雯之敘寫手法，卻是廣徵奇字，多采排比，巧用比喻，使得兩篇知識文章都成為田雯美感經營的見證。在〈朱砂〉篇後，還附錄田雯所作〈賦〉一篇，更是極盡華藻與典故之能事。故丁煒在〈砵硯〉篇後附註曰：「升汞事極瑣細，入古雋之筆，始知九還再在御，頑鑛皆可成金。」⁴¹ 也就是說，田雯的書寫，可以比同為一種精密的煉製的工藝，而不只是實際技術過程的傳達。請試以《黔書》與《天工開物》對煉汞的記載相比。《天工開物》之〈丹青第十四〉介紹「朱（砂）」，說及升汞的程序：

凡升水銀，或用嫩白次砂，或用缸中跌出浮面二朱，水和搓成大盤條。每三十斤入一釜內升汞，其下炭質亦用三十斤。凡升汞，上蓋一釜，釜當中留一小孔，釜旁鹽泥緊固。釜上用鐵打成一曲弓溜管，其管用麻繩密纏通梢，仍用鹽泥塗固。煨火之時，曲溜一頭插入釜中通氣，一頭以中罐注水兩瓶，插曲溜尾

⁴⁰ 同前註，頁 527-528。

⁴¹ 見田雯，《黔書》，頁 528。

於內，釜中之氣達於罐中之水而止。共煨五個時辰，其中砂末盡化成汞，布於滿釜。冷定一日，取出掃下。此最妙玄，化全部天機也。⁴²

宋應星的文字處處彰示著實用的價值，確切指出數量（如三十斤、兩瓶、五個時辰）、材質（鐵、麻）等技術要求，語言則更是講究樸質精確，近於白話，更不用說還附圖以利讀者瞭解。由以上比較，可以看出明代宋應星所記，在製作技術方面更為詳盡，但文辭方面則遠遠不似田雯的費盡心機，追求美感。

但沈浸於文字美感的背面，作者還要強調治理者的仁心。所以〈朱砂〉篇後之〈賦〉，以悲憐受累的人民結尾：「願下令而長禁，砂其莫產山谷，何為苦此一方民。」⁴³ 丁燁在其後的附註中更繼續發揮田雯的關懷，曰：「物之寶者，取之必殫其勞。采砂之法，約略與采金同。嗟夫！天地生物，本以利人。迨采者既竭，而求者未厭，則利適滋害矣。再讀黔行紀程詩，〈采砂〉、〈淘金〉二謠，幾下捕蛇之淚。」⁴⁴ 丁燁在這裡提到的兩首歌謠，都是田雯《古歡堂集》⁴⁵ 所收有關黔地作

⁴² 參見〔明〕宋應星著，潘吉星譯注，《天工開物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頁294-295。

⁴³ 田雯，《黔書》，頁527。

⁴⁴ 見田雯，《黔書》，頁527。

⁴⁵ 本文引述將使用《清代詩文集彙編》據德州田氏刻本影印之版本。《古歡堂集》兼收田雯的詩集與文集，詩集部分十五卷，文集二十二卷，共三十七卷。今存的數種版本，註明之卷數或有所不同，但查核其目錄與內容，其實都是詩十五卷，文二十二卷。各版情況簡略說明如下。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田氏叢書」所收之《古歡堂集》，為康熙乾隆間刊本，稱有詩十五卷，文二十一卷。考其書，事實上文有二十二卷。《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七十三列《古歡堂集》三十六卷，凡文二十二卷，詩十四卷。文淵閣《四庫全書》著錄「《古歡堂集》三十六卷，附《黔書》二卷，《長河志籍考》十卷」，但查其內容，實有詩十五卷，文二十二卷，共三十七卷。文津閣《四庫全書》著錄《古歡堂集》四十九卷，其實乃合文二十二卷，詩十五卷，《黔書》二卷，《長河志籍考》十卷，而成四十九卷。作三十六卷者，實誤。文淵閣、文津閣本《古歡堂集》所收略有不同，可參楊訥、李

品中，明顯指向社會議題的篇章。〈采砂謠〉曰：

大如牛，赤如日，官府學神仙，取砂何太急？囊有砂，釜無粟，
奈何地不愛寶，產此荼毒？砂盡山空，而今烏有。皂衣夜捉人，
如牽雞狗。匍匐訟堂，堂上大呼弗已：誤我學仙不長生，爾當
鞭笞至死！⁴⁶

〈采砂謠〉對當地官府過度催逼煉製水銀，造成環境的破壞與人民的痛苦，提出戲劇性且嚴厲的批判，故丁煒建議應與〈朱砂〉篇並讀。然而，雖然〈采砂謠〉與田雯任官貴州的經驗直接相關，卻未如寫朱砂的〈賦〉同樣收入《黔書》。何以故？是否可能有篇幅以外的因素？筆者以為，雖然同在《黔書》的文本脈絡，但詩性美感與治書知識的經緯在交織中仍舊分明。〈朱砂〉一文以精妙文字描寫採砂過程，但止於技術的說明；朱砂之賦進一步渲染美文，僅在結尾處對採砂提出委婉的質疑。而〈采砂謠〉卻藉著相對素樸的歌謠形式，以直白的語言呈現採砂人的疾苦與征斂官員的醜惡。田雯在彙編《黔書》時，畢竟是以地方大員的角度發言，因此，雖然執著文采，但只宜提出正面的社會觀察與統治的建議，卻沒有立場對執政發出嚴厲的批評；《古歡堂集》則是私人著作的集子，儘可以收錄抒發情感與表達意見的作品。由這個例子，我們更能清楚認知《黔書》在田雯著作中的位置。

除此之外，《黔書》還收了多篇描述山水或考證名勝的文字，描寫對象包括紫池、關索嶺、葛鏡橋、鐵索橋、大相見坡小相見坡、白水巖、涵碧潭等，都是描寫與議論並行，而且文采斐然。或者可以說，

曉明，〈《四庫全書》文津閣文淵閣本清別集類錄異〉，《北京圖書館館刊》1995年1/2期，頁78-79。與淵、津二本相較，「田氏刻本」所收最全。至於其他如《筆記小說大觀》所收《古歡堂集》卷數不同，乃因出於特別編輯考量而摘錄而成，可置而不論。

⁴⁶ 田雯，〈采砂謠〉，《古歡堂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據德州田氏刻本影印），第138冊，頁225。

這部份文本的核心是審美，尤宜與《古歡堂集》互參；議論是周邊，經常寄託了作者的歷史感懷以及治黔心得。對於貴州山水，田雯的態度非常複雜。若只由《黔書》所錄的篇章來看，那麼可說田雯對貴州山水，經歷了由排斥到接受的過程。起初，他受到傳統山水美的影響，對貴州之山皆童阜、水不通舟楫，若有憾焉，但後來在觀覽中，才開始欣賞不同的美感，並且認知山水需要知音賞鑒，才能為世人所知。所以他在〈山水〉一篇中說：

山皆石，則巖洞玲瓏，水多潛，故井泉勃窣。……其餘一邱一壑，怪石轟湍，在在有之，而未暇詳，是皆禹跡之所不經，酈元之所未注。時無柳子，孰問鈎鋤之潭，遊乏客兒，誰闢石門之徑。遂使山靈藏其姓字，不求封禪於長安，水伯匿其聲光，以待品題之高士云爾。⁴⁷

換言之，田雯認為貴州山水未經品題，故乏人登覽，他要扮演柳宗元之於湖南山水的角色，以文字為山水增色，使黔地美景為世人所知。的確，《黔書》所收田雯的多篇山水文字，詳盡描寫了當地景色。以此而論，田雯簡直扮演了現代意義的旅遊代言人角色了。如他在〈白水巖〉一文中寫瀑布云：

每晨曦欲吐，重霧上騰，榮光塞河，遮蒙掩映，遙看素練，跡倏有無，如冰綃之被玉肌，煙縠之籠皎魄，尤為曠絕。……肆閱清野，俛仰流連，茆屋數間，依然荒落。安得十日坐臥，與林徒栖託，雲客宅心也耶。⁴⁸

白水巖瀑布即吾人熟知的貴州名勝黃果樹瀑布。作者以一「每」字，暗示了他觀賞此景並非只有一次，但仍然觀之不足，所以希冀擺脫公

⁴⁷ 田雯，《黔書》，頁491。

⁴⁸ 田雯，《黔書》，頁499。

務牽絆，以雲遊者的心態棲止於此，與奇景流連相親。評者丁煒稱贊田雯此文「刻意摹寫，曲盡恫心駭目之觀」，而作者用心觀覽，寫意馳情，不必受前人對黔地民風之描述的制約。事實上，田雯有不少受黔地啟發而撰的詩作，並未收在《黔書》，以白水巖為題材，就有一首〈白水巖放歌〉，收入《古歡堂集》。此詩於詩題下自註「九言」，內容實與《黔書》的〈白水巖〉一文相參照，而更以罕見的九言形式，由形象與聲音傳達瀑布之奇麗，於此尤可見到黔之山水如何成為田雯的詩情實驗場。其詩曰：

我生嗜好與俗殊酸鹹，獨於高山流水心饞貪。
匡廬瀑布天下稱奇絕，何如白水河灌犀牛潭。
銀漢倒傾三疊而後下，玉虹飲澗萬丈那可探。
聲如豐隆奮地風破碎，濤如天孫織錦花鬢鬢。
濺珠跳沫行人衣裾濕，雲垂煙接山四峰巒尖。
小犢出遊太真所不照，乖童結隊古冶豈能殲。
半紅半黑飛斗大蝴蝶，千章萬株森十圍松杉。
獾獠熊狸鬚髯爪牙古，鼃鼃蛟螭晝夜風雨酣。
安得十日五日坐潭上，二三酒侶看月凌朝暹。
頭腦冬烘酈道元未註，屐齒偏塞謝客兒多慚。
解衣槃薄箕踞於其側，青天搔首我誦白水巖。⁴⁹

此詩與〈白水巖〉一文在文字上有很大重疊，不論辭彙、意境或詩人心緒都可互證，而詩更回頭觀照《黔書》中的〈山水〉一文，怨酈道元、謝靈運於這等奇絕山水竟未能有一字道之，稱酈道元頭腦冬烘，可發一笑。讀者必然注意到，此詩不但九言的設計特別，用字也費心講究，很能集中表現田雯的寫作風格，尤其是他博學強記且好用奇字

⁴⁹ 田雯，〈白水巖放歌〉，《古歡堂集》，頁270。

的特點。⁵⁰ 這些特色也都在《黔書》的許多篇章中有所展現。

而在〈飛雲巖〉一篇中，田雯更直接駁斥外人以為黔之山水不足觀的看法，指出遊客必得通過考驗，才得以欣賞奇山異景：

天下之山聚於黔，延袤數千里，行旅往來，日攀躋於窮嶺絕壁之間，手胼胝足，雖夙瘳泉石者，莫不困頓踣躓，聽鷓鴣而生悔，謂莊躋之多事也。東坡之陽曰飛雲巖，途次至此，則心目開霽，又皆裴回瞻眺，遷延徙倚而不肯徑去。豈謂黔山無奇足以殫人也哉！⁵¹

作為風景的觀覽者，田雯認為若非先放下對貴州山水無文的成見，必不能達到在自然景觀中流連瞻眺的境界。地理的窮嶺絕壁，人的困頓踣躓，或不只是有形的山水與身體，更可做物我的象徵觀。

同時，自然與風俗的結合趣味也在書中有所呈現。試舉〈大相見坡小相見坡〉一文為例：

領名，黔人謂嶺曰坡，……陟首坡則尾坡見，至尾坡迴矚之，則首坡見，立中坡前後望，首尾畢見。……行者此以手招，彼以口呼，送響嗒於咫尺，而不知三十里之遙也。……沿尾坡而下之，白雨溪橫，黃雲稻熟，僦人率彼婦子，挽裳以穫。小犢在旁，犴犴遠側，客過輒起立。去則侏離盱眙相對語，擔夫勞瘁，止息於樹下，其聲嗚嗚，山謠可聽也。⁵²

所謂「相見坡」，指山路紆迴，以致坡首與坡尾雖然實際距離遙遠，

⁵⁰ 「德州田山薑讀書挾拾字句，有鉅釘之目。嘗云：奇字古人所常用，於古詩為尤宜。班、馬等賦，所以令人嵬眼頹耳者，政由時出奇字襯復之。方今文章尚古，吾黨之士獨不訪子雲之亭，熏班馬之香乎？」見〔清〕阮葵生，〈文章好奇之癖〉，《茶餘客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卷10，頁232。

⁵¹ 田雯，《黔書》，頁502。

⁵² 同前註，頁495。

視覺與聽覺上卻有相距尺度的錯覺，對行道之人來說是一種地形造成的特別趣味。評者丁煒提出了兩個評論。其一，他對本文作了引申的解讀，認為黔地山坡本是過客憂懼的險地，現在因為田雯撫黔的威德，已使得畏途變為坦途。其二，他贊歎本文描寫的起伏曲折，類於坡公。⁵³ 筆者則以為，田雯描寫黔地山水的文章，的確常有寓意，但本文卻是特別講究聲色與情感的營造，寄託並非重點。田雯在此文中描述自然地形特色後，繼之寫自己眼光中地形引出的人文景觀。兩為溪、稻為雲，顏色具有高度，而坡下小犢伴著夙人老少，人聲也成為景色的一部份。為突出人聲語言的效果，文後附有作者仿其意所作的山歌四首（亦收入《古歡堂集》），現錄後二首以見其意：

奈此翻漿白汗何，趕場大弄（日午）不停梭。

歹雞（坐也）後嶺望前嶺，雅務（不好難行）小坡愁大坡。

脣下蘆鳴月下跳，搖鈴一隊女妖嬈。

阿蒙（母）阿亭（父）門前立，果瓮（行役）人來路不遙。⁵⁴

在《黔書》中，田雯多次強調黔地語言對他來說是盱眙難解但有趣可聽的，甚至有一文專記他掌握的當地「方言」。無疑的，當地語言對田雯來說是一種趣味，也算是由瞭解民情而方便統治的工具。在〈方言〉一篇中，田雯分別以「拔，父也，一曰罷」、「父為包，母為蔑」、「父謂之索，母謂之咪」、「上墳曰砍地里」四種句型，介紹了四種不同語言的七十餘個日用詞彙。⁵⁵ 除了父母、飲食、數字這些普遍詞語之外，還有「食烟」、「趕集」、「不識漢語」等反映地方特色的語彙。田雯對當地聲音的興趣，當是與他對文化的好奇連結的。〈山歌〉中

⁵³ 見《黔書》，頁496。

⁵⁴ 田雯，《黔書》，頁495。

⁵⁵ 同前註，頁484。

使用的地方語言，多半也見於〈方言〉，例如大弄、雅務、阿蒙、阿亭（〈方言〉作「拔」），見證田雯傾聽聲音，並且試圖融合於詩歌中，創造特殊的地方感。〈大相見坡小相見坡〉一文，將聲音的美感帶入自然景色，再以當地語言入歌，於是此文與詩便呈現了一個外來行者（而未必是統治者）怡情於聲色之間的畫面。

亦有寄託感懷勝於山水審美的例子，例如〈東山〉一篇。⁵⁶ 此篇記述作者登上東山一峰，「坐危閣，凭欄高矚」，而「一郡煙火人家，歷歷在目」。在這登高望遠的活動中，高度與距離感促使田雯採取了治理者的角度，因此他不再觀覽，而是轉而思考：

夫昔人叛此閣，攬黔之盛也。而黔之盛難矣。自平播、平水西而後，又數經喪亂，以訖今日。……善人為邦百年，勝殘去殺。黔之貧且災已數十年，其綏輯安全之也，方五、六年。余治黔未一年，而於茲攬其盛者，由聖天子止戈蠲租，仁義涵煦之深也。

若從最後幾句話的表面看，我們可能要批評田雯一方面自我表揚，一方面拍皇帝馬屁，稱頌聖德。其實，田雯登高而眺，幾曾看到「黔之盛」呢？恐怕「黔之盛難矣」才是實相。田雯在三藩亂後奉派治黔，要面對的正是如何撫平喪亂的創痛，而非坐享承平的樂事。因此，〈東山〉一文可說在政治頌聖的表象下，託付了自己的憂思，無怪丁煒的評論將之與歐陽修〈豐樂亭記〉比較，稱二者乃同一興會。至於對景物的感受與描寫，則被邊緣化了，這是〈東山〉一篇與《黔書》中其他寫景篇章很不同的地方。

綜合以上討論，我以為這些文字在審美價值之外，還值得注意其中透露的情感，亦即田雯對黔地風物，除了身為巡撫的責任感以外，

⁵⁶ 同前註，頁 504。

確實從其中得到從遊歷、好奇到認知、思考的樂趣。我們不妨選擇田雯〈黔風〉一篇所附〈迎春詩〉的後半部份一讀：

山謠秧歌語莫辨，盱眙口眼群相將。
逐隊結連各變化，風檣陣馬神飛揚。
熨童年紀十四五，朱鉛塗面錦衲襠。
或彈箏篴弄箏笛，或披甲冑揮戟槍。
或騎兕象佛子國，或鬪珠貝波斯羌。
壯者壁壘頗與牧，美者嬌冶施兼嫿。
旋風豈類天魔舞，當筵不是成都倡。
最後一隊更奇絕，身輕一鳥空中翔。
聳尻翹足立肩背。公孫劍器爭毫芒，
斑文狸走雲旂動，遊龍蜿蜒來何方。
掉竿弱索又一隊，羊獍乞狍排兩廂。
村翁侏離女猱鬼，搖鈴跳月心顛狂。
金鍍雙睛銀貼齒，假面獅子吟西涼（白樂天有西涼伎上句即用白語）。
鍾馗手拍銅鞮板，擲揄調笑隨白狼。
傀儡登場乃如此，何年演自宜春坊。
木瓜金筑接六詔，一髮萬里西南疆。
山青敢嗟瘴癘毒，雪消且喜梅花香。
羅施之戲迎春曲，放衙觀者如堵牆。
他時採作黔俗記，蘆笙夔鼓牂牁鄉。⁵⁷

詩中固然用了不少文字傳統中與滇黔早結不解之緣的套語，如羊獍、乞狍、侏離、傀儡、瘴癘等等，但詩人運用自己的耳目以感受迎春隊

⁵⁷ 同前註，頁 482。此詩亦收入《古歡堂集》，頁 267-268。

伍之活力的努力，確實清晰可見。不論田雯由史書、方志、筆記抄寫了多少他以為有關治術的紀錄，複製了多少「難治」、「不馴」、「好殺」、「為患」的印象，猶如經線般為他的貴州圖景定軸，但欣賞、體會以及反饋於心的詩情，卻如同緯線，反覆來回，上下穿梭，使黔地之顏色、音聲活躍地浮現於刻板的志書背景之上。

四、物、景、人——《黔書》的喻言系統

在《黔書》的織錦書法中，山水是構成圖案的重要部份。另一個值得留意的面向，則是一般志書都會著墨的物產。田雯對物產，特別是人工器物，有很深的興趣，不但仔細觀察，而且往往賦予個人化的解釋，使得物與人產生有意義的連結，成為田雯之西南視野的特殊風景。

前引王士禛對《黔記》的評語，便曾提到在此書不統一的體格中，有似《考工記》者。確實，在《黔書》中，有多篇文章講到黔地的物產與器物，如〈革器〉、〈朱砂〉、〈砵礮〉、〈雄黃〉、〈蒟醬〉、〈藥弩〉、〈凱里鉛〉、〈雞縱〉等等，描寫都非常詳細且有可讀性。特別是其中有關工藝、技巧的篇章，鮮明的展現了作者的格物興趣。故評論者丁煒也認為田雯的筆法「奇峭如考工記」。

在前一節中，筆者已討論過〈朱砂〉、〈砵礮〉二篇，如何同時具有物產解說、文字工藝與社會批判的價值，而三者又為何形成緊張關係。在此節中，筆者則希望轉向具有文化象徵性的事物，在《黔書》中如何得到表現。

我們可先以書中所寫的器物「蘆笙」為例。西南地區的跳月之俗，以及所使用的樂器蘆笙，是明清方志與筆記經常寫到的。田雯對蘆笙，卻有特別細緻的描寫：

其笙截蘆為管者，六通其節而櫛比之，長者四尺，以次而殺，短至三尺，參差若羽竅。其短者孔六，以達於長，以指捫之。而又截竹徑尺，橫縮於六管之銜而吹之，一呼一吸，聲若駕鵝之嘹漢。……長管之上冒以匏，短管之中置以簧，簧用響銅為之，恆用火炙，亦古制也。……苗俗固不嫻音律，而其應節之轉，逐聲之移，則又甚善，余覓而眎之，其狀如此。⁵⁸

在此之前，西南民間的代表性樂器蘆笙雖頻頻在各種記錄中出現，讀者卻只能望文生義，各自揣測蘆笙的形象，倒是容易引起外人遐想的跳月習俗，成為描寫的主角。田雯的〈蘆笙〉一文則反之。作者雖然提到蘆笙是孟春跳月所用的樂器，但並未就此發揮，而專注於描述樂器的形制與聲音特色。田雯對此顯然是自覺的，因為他特別在文末點出他直接接觸了蘆笙，而非只是保持距離的觀看。因此，他描寫蘆笙，乃是透過對蘆笙的細部觀察，如實描寫，而非抄書或訴諸聽聞。這樣對器物的興趣與一探究竟的精神，貫穿了一系列與物產器物有關的篇章。

由於在物產工藝方面，田雯並不倚賴已存的歷史或志書資料，因此其志書體／詩文體織錦法更能在同一篇中發揮。例如在〈水西馬烏蒙馬〉一文中，田雯就以「水西烏蒙近於西，故多良馬」為前提，用極為吸引人的敘事筆法，分別描寫水西與烏蒙名馬的特色。作者可謂欲擒故縱，先以繁複的詞藻，極力寫水西馬「馬狀甚美」，謂其「龍髭晃臆，肉角蘭筋」，堪稱絕美的良馬，然後筆鋒一轉，指出水西馬雖美，卻無屋蒙馬之「異」。烏蒙馬之異，不在其天生的軀體健美，而在當地人訓練幼馬的方法之奇。田雯描述，當地人「繫其母於層巖之巔，置駒於下，餒之，移晷，駒故戀乳，不可得，倏縱之，則旁皇躑躅，奮迅騰蹕而直上，不知其為峻矣。」這是訓練登高。「已乃繫

⁵⁸ 同前註，頁 531。

母於千仞之下，而上其駒，母呼子應，顧盼徘徊而不能自禁。故弛之，則狂犇衝逸而徑下，亦不知其為險矣。」這是訓練奔低。如此，「則其膽練矣，其才猛矣，其氣肆矣，其神全矣」，良馬於是而養成。在詳細講述訓練烏蒙馬的過程之後，作者突發一句結論曰：「天下事何一不由學，況馬乎？」⁵⁹

若單獨讀〈水西馬烏蒙馬〉一文，可說田雯對水西馬之美，以及烏蒙馬特別訓練的觀察，皆無微不至，而其結論，則可視為文章見微知著的引申之論。不過，若與田雯其他幾篇看似論物的文章一體來看，那麼對「天下事何一不由學」，便有不同的理解。試舉〈牡丹〉一篇。若由表面文意觀之，田雯寫這篇文章的起因，不過是其官衙正好開了幾株牡丹，但是他卻把黔地是否可以種牡丹一事，大大申論了一番。文章由歐陽修的〈洛陽牡丹記〉說起，先為讀者梳理歐陽修提出的道理，而田雯自己又介入其中，把他對黔地的思考帶進來。首先，人皆曰牡丹以洛陽為第一，何以如此呢？歐陽修說，若按照一般人的說法，這是因為「洛陽居二河間，古善地，……此蓋天地之中，草木之華得中和之氣者多，故獨與他方異」⁶⁰，也就是說地靈花傑。此時田雯插入問道：

若夫黔則華陽黑水，為方輿之書所不屑載。一望赭石禿巔，並草木而甚少之，況花乎？而況花中之瑤黃玉而魏紫后乎？⁶¹

蠻徼荒寂之地，連一般草木都難以生長，何況是嬌貴的牡丹？然而作者又接著引述歐陽修挑戰俗論的精彩論點：

洛陽於周所有之土，四方入貢，道里均，乃九州之中；在天地

⁵⁹ 同前註，頁 525。

⁶⁰ 〔宋〕歐陽修撰，李逸安點校，〈洛陽牡丹記〉，《歐陽修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 年），頁 1096。田雯文中直接引用了這段文字，見田雯，《黔書》，頁 535-536。

⁶¹ 歐陽修，《歐陽修全集》，同前註。田雯的引述大體相同，見《黔書》，頁 536。

崑崙旁薄之間，未必中也。又況天地之和氣，宜遍被四方上下，不宜限其中以自私。⁶²

在歐陽修原文中，對俗常以為洛陽為天地之中的說法，「甚以為不然」。所不然者，有兩個層面。就地理世界言，洛陽只是唐代中國的九州之中心，而不是更廣闊的世界的中心。就天地之理言，天地之氣至公，不應有所偏私。田雯這才熱切呼應歐陽修的看法，認為歐陽修的思考「殆欲四海之大，九州之遠，無一夫一物之不獲」，是一種「仁人之言」。其實，在〈洛陽牡丹記〉原文中，指出洛陽牡丹之所以極美，不但不是因為得到「中和之氣」，反而是因為得到「偏氣」，並非正常之物，甚至可說是草木之妖，只是因為美麗而見幸於人。田雯因此而問，何以不生長牡丹的貴州，卻獨在自己官衙旁長了牡丹？莫非也是妖異？如此，藉著引述歐陽修並與之對話，田雯得以借題發揮，開始引申他對黔地草木——特別是牡丹異種——的想法：

然而黔之無草木也，風土殊也，又斧斤之過也；牡丹之不常有也，以菡植而愛惜之者寡也。黔乎亦於物何所不宜，而曾無人焉菡植而愛惜之，縱有名花奇卉，而終不免於淹沒零落，寂寂於蠻徼山谷之間者，可勝道哉。⁶³

田雯認同歐陽修，所以貴州草木不繁茂，必非因為天地之靈氣不鍾於此，而有其他原因。固然自然的條件、人為的伐斲都有影響，但田雯認為關鍵在於無人愛惜，所有就算有名花，也不免獨自零落的命運。那麼，田雯說的就是花，只是花嗎？文章本身並未進一步發揮，而是驟然而止，留餘味讓讀者細思。

在筆者讀來，不論是烏蒙馬，或是牡丹花，雖然出現在個別的文

⁶² 田雯，《黔書》，頁 536。

⁶³ 同前註。

章中，卻都屬於《黔書》物／人的喻言系統。若與〈黔士制義〉一文並讀，意涵便能彰顯。〈黔士制義〉一文，不論其實際的創作次序，在《黔書》中的位置是全書最末一篇，具有定錨的意味。在此文中，田雯再次回到地方大員的身份發言，勉勵貴州讀書人努力仕進。人才一如草木，不必然受限於環境，但必須愛惜才有發展，所以田雯師歐陽修之故智，先述俗論：

黔，三苗鬼方，習格鬪，喜兵戎，不可以文章治也。⁶⁴

再針對一般人的兩項成見，以由自己的親身經驗一一予以批駁：

余心竊疑之。……嗟乎，黔豈無才乎！說者謂山童澤涸，石磽土瘠，蠻荒天末，其地不靈。……況兵燹之餘，家貧智短，智隳學疏，鮮不拘墟固陋，甘與草木同腐耳。余是以疑而信，信而復疑，以為黔不當若是也。遂於勸農講武之暇，進黔士而叩之，見其人多磊落通脫，其文亦蘊藉深沈，如玉在璞，如珠在淵，如馬之伏櫪。⁶⁵

在肯定黔士的天賦之後，田雯轉而委婉點出他們缺乏足夠訓練的事實，並表達對此地「人才日盛，文章一心」的期待，更要求「黔士無以曹鄴邾莒小邦自囿」。那麼，以此文的論述為主軸，有關牡丹花的「非環境決定」說，以及有關烏蒙馬的「無事不由學」說，甚至其他有關物產與器物的篇章，我們便都可讀到其中內在的關連性。於是，方志體的事實陳述與詩人的人文精神，便藉由這以物喻人的書寫策略而結合。

⁶⁴ 同前註，頁 542。

⁶⁵ 同前註。

五、豈不陋哉？豈不陋哉？——治書話語與審美心理的雜音

在〈黔士制義〉一文中，田雯力圖將好官的角色發揮到極致，推廣教育，鼓勵科舉。確實，藉著教化的方式，田雯在地方記憶中成為一位值得紀念的清初官員。然而，在探究《黔書》中治書與審美的文類緊張性之外，我們還須面對田雯作為書寫者的內在矛盾。田雯雖然執著於文學經營，但《黔書》是有所為而作，其目的性非常明確，那便是作為作者政績的證明，以及後來者的施政參考。因宦旅而編寫有關當地史地社會的著作，田雯當然只是繼承了一個書寫的傳統，即使只看其前朝的明代，那麼本文一開始引述的田汝成，或者寫《廣志繹》的王士性，都是最明顯的例子。若以黔地為焦點，那麼晚明名臣郭子章（1543-1618）在萬曆年間剿滅播州楊應龍，任貴州巡撫十年，著成《黔記》六十卷，更是浩蕩奇偉，當為後世治黔者所宗。⁶⁶ 上述三個人物的西南文本，都曾為田雯徵引，包括篇幅甚為短小且安排隨性的王士性《黔志》。⁶⁷ 田雯並謙稱自己「才地不及青螺遠甚」，稱譽郭子章除了工於文章，更「撫黔垂十年，多惠政，正直仁恕，屢立戰功，又不止於文章乎」，⁶⁸ 言詞間頗以郭氏為典範。筆者以為，郭青螺體大思精、秩序井然的《黔記》，與田雯注

⁶⁶ 〔明〕郭子章《黔志》六十卷，包括歷史、星野、輿圖、山水、祭祀、藝文、學校、職官、兵戎等志，以及帝王、宦賢、遷客、忠孝、貞烈、隱逸、方外、宣慰土司等人物傳記，最後結以「諸夷」與「古今西南夷總論」兩卷，可謂包羅天文、歷史、地理、典章、制度與人物各方面。見郭子章，《黔記》，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貴州府縣志輯》（成都：巴蜀書社，2006年）第2冊與第3冊。

⁶⁷ 田雯描寫貴州的柳院時，提到「《黔志》所載養龍院也，在養龍司。」田雯，《黔書》，頁42。引述的出處可見王士性，《黔志》，收入《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據學海類編本排印），第3182冊，頁4。

⁶⁸ 田雯，《黔書》，頁514。

重文學性的《黔書》，代表宦黔治／志書的兩種典型，而對清代留意西南地方的人來說，《黔書》易得，且參考價值更高。例如李宗昉（1779-1846，曾督貴州學政）的《黔記》、張澍（1776-1847）的《續黔書》、吳振棫（1792-1870，官至雲貴總督）的《黔語》，都是在田雯所創造的語境下編寫。李宗昉在《黔記·序》中，指出自己所記乃是「田氏《黔書》及《通志》所未及載」⁶⁹，而書中更不時引述《黔書》或與之對話。張澍則直接說明他的著作原題《黔中紀聞》，「以田霞綸先生著《黔書》，改曰《續黔書》」。⁷⁰由此看來，《黔書》實可稱為這一系列貴州治書的典範。既欲為治，從地方官員位置發言的作者，其思考、書寫與編輯策略必受到制約。筆者在前文中已比較收在《黔書》中的〈朱砂〉篇與田雯其他相關文本如〈采砂謠〉之間的差異，說明《黔書》作為治書的限制。不過，更值得注意的是，《黔書》是一個刻意圈圍的文本空間，在統治與審美之間自成邏輯，但當我們把它放回作者整體的書寫脈絡中時，隱藏的矛盾、掩飾、焦慮甚至仇恨等種種雜音就蠢蠢欲動，將要衝決治臣的面具與書寫類型的網羅。

雜音有高低浮潛之別。那高聲的、喧昂的聲音，原來被機巧地排除在《黔書》的文本空間之外，但我們很容易就能在更為個人性的《古歡堂集》聽到。這一篇文字的標題直截了當，稱為〈黔陋說〉。田雯將他曾經治理的貴州，與相鄰且並稱的雲南做了殘忍的比較。對王朝的中心來說，滇與黔都屬遙遠的蠻荒之地，然而，田雯認為這是錯誤的認知，因為黔不過是滇的門戶：

陋哉！黔也。與滇並稱，自京朝言之，以為同處萬里之遙耳。

⁶⁹ 〔清〕李宗昉，《黔記》，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貴州府縣志輯》（成都：巴蜀書社，2006年），第5冊，頁550。

⁷⁰ 〔清〕張澍，《續黔書》，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貴州府縣志輯》（成都：巴蜀書社，2006年），第3冊，頁547。

以山川疆域考之，均為楚莊躋開拓地，西南荒徼，蠻髦靡莫之鄉。……（黔）豈不陋哉？豈不陋哉？⁷¹

在連續發出如此深掘內在，大開心防的感嘆後，田雯一一列舉雲南的豐富物產，以證明其優勢：

即一滇也，五華點蒼，峰巒聳秀；金沙洱海，波濤滌洄；以暨孔雀、翡翠、蒼尾、象齒、琥珀、瑟瑟、檳榔、金、鐵、茶、漆之產，不可勝數。⁷²

相對的，貴州的「特產」在田雯的眼中卻是窮絕的環境、兇殘的禽獸、神秘的疾病，以及形體面貌陌生如鬼的苗民，他們差可比擬為蟲。⁷³ 在對比之下，黔地的鄙陋簡直令人驚詫：

若夫黔，山禿水窮，草木亦稀，跬步亂石，日與蛇蝮、虎豹、蠱毒、瘴癘相周旋。鬼方多鬼，青白黑赤，各異其名，魑魅魍魎，隸籍而分部，擲掄於道路，充斥於市衢黎丘蘆亭之間，蠕蠕動也。嗚呼！何陋之甚耶！……當滇黔兩戒之交，十步之內，疆土風物，妍媸頓殊，一似造物有心，自洪荒時劃山川而為二者，亦甚可怪也。⁷⁴

田雯曾在《黔書》中一再渲染貴州山水特異之美，這裡卻只看到窮山惡水；同樣的，他曾借重閱讀書籍與近身觀察來理解的當地民族，此時只剩「青白黑赤」的標記差別。種種嫌厭互為相乘效果，形成「陋

⁷¹ 田雯，《古歡堂集》，頁 508。

⁷² 同前註。

⁷³ 將異民族比擬為鬼，為獸，為蟲，大體顯示一種華夏中心意識，然而又糾結著遠較民族歧視問題複雜的文化乃至世界觀。相關討論可參見胡曉真，〈華夏忠臣遭遇邊域保蟲——《野叟曝言》與《蟬史》中的西南書寫〉，《中國文學學報》，第 2 期（2011 年 12 月），頁 231-256。

⁷⁴ 田雯，《古歡堂集》，頁 508。

之甚」的結論。

雖然仍舊表現田雯擅長的排比、豐美、高峻的風格，但相較於《黔書》各篇描寫山水、風俗、器物的精雕細琢，〈黔陋說〉明顯展露了較少修飾、不可遏抑的私人情緒。如果說整部《黔書》的預設是「何陋之有」，〈黔陋說〉表達的則正是「豈不陋哉」。那麼，我們是否亦應驚詫於作者之昨是今非，或者心口不一？此時，我們尤須考慮田雯的夫子自道。他在〈黔陋說〉的結尾如是說：

余撰《黔書》，嘗思粉飾其說，以洗黔之陋。道士祝天寧自滇來，述滇之勝。……余縱懸河之辯，效枚乘七發以爭之，卒莫能勝，而黔之陋如故。⁷⁵

這幾句話給了我們重要的線索。其一，田雯似乎坦白交代了《黔書》的政治目的與相應的書寫策略。所謂「粉飾」，簡單的解釋就是田雯出於撫黔的「政治正確」的需求，戴上了假面，掩蓋了自己的情感，扭曲了自己的看法。那麼，這豈非拆解了自己寫作的真誠？當他寫涵碧潭之「煙雲演漾，風日遲回，穀軟鷗眠，沙明蚌兩，……春波搖綠，秋沚澄青，岸柳乍垂，芹芽正駢」，而感嘆「誰謂黔中無佳山水哉？」且「余於是一往有深情矣！」⁷⁶難道都是虛枉？《黔書》華藻奇麗的語言特色，難道都只是文字的操演場，而與詩人的真實感官經驗與感情無關？對我們來說，讀到了〈黔陋說〉，是否方便我們刺探、批判殖民者、統治者及種族主義者的「黑暗之心」？

筆者以為，〈黔陋說〉與《黔書》並讀，不必定須解釋為彼此的否定。毋寧說，二者的牴觸造成一道裂縫，讓我們得以穿透《黔書》那治/志書與審美的表面張力，窺入隱晦幽微（但未必黑暗）的核心。田雯在〈黔陋說〉中自述與來自豐饒雲南的祝姓道士爭論而不能勝，

⁷⁵ 以上〈黔陋說〉引文皆見田雯，《古歡堂集》，頁508。

⁷⁶ 田雯，《黔書》，頁501-502。

正是第二條線索。筆者以為，在爭論中感受的挫折，影響田雯的回憶並促成了〈黔陋說〉。原來，《黔書》的繁複修辭，一方面固然是田雯的寫作風格，一方面，也體現了田雯如何以書寫抵抗自己（排斥宦黔的）心理狀態。奉派西南是艱苦的任務，明代的田汝成就說多數官員「一閱除書有遠方之命，即索然沮喪，無復用世之志」⁷⁷，唯有做好心理建設者才能適任，否則即是庸懦之輩。田雯不亦如此嗎？編寫《黔書》是田雯自我定義、自我證明的方式，不僅其寫作風格的藻麗就是自我的審美，對黔地的心理認同雖是學而得之，更是自我價值的認可。因此，與祝道士辯論的失敗，其實便指向自我塑造的失敗，於是導致自我的否定。豈不陋哉？豈不陋哉？

六、結語

以當代的角度，我們很容易看穿所謂「好官」敘述所隱含的民族／地域偏見與統治手段。不過，這種批判似乎已然熟爛而顯得太輕易。本文希望藉由田雯《黔書》這個例子所討論的，並不是反省漢族官員帝國中心的治道，也不是對志書敘事的批判性閱讀，反倒是重新發掘《黔書》的文類複雜性與文本的細節，將這塊以治／志書為經、詩文為緯的織錦布，正反翻看，尋覓金針的線索。正如《四庫全書》在〈古歡堂集提要〉所描述的：「雯則天資高邁，記誦亦博，負其縱橫排闥之氣，欲以奇麗駕士禎上，故詩文皆組織繁富，鍛鍊刻苦，不肯規規作常語。」⁷⁸ 此一評價亦適用於《黔書》。同時，田雯在同代人眼中，也是一個有癖好新奇的怪人，⁷⁹ 這同樣表現於他的作品中。

⁷⁷ 田汝成，《炎徼紀聞·原序》，頁1。

⁷⁸ 紀昀，〈古歡堂集提要〉，《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263，頁2。

⁷⁹ 「予友季柳亭云：山董告歸，臥病牀第，醫以方進，惡藥俗不飲，易以他名，乃喜。如以枸杞為天精，人參為地精，木香為東華童子。其癖好新奇，老而愈怪。柳亭即山董女孫婿

《黔書》其實只是眾多明清時期西南敘事中的一個例子，但是這種追求繁富、講究鍛鍊的風格，不肯與人同的堅持，以及癖好新奇的心理，加上與作者地方官員身份的衝突，使得《黔書》在眾多西南敘事文本中有突出的文學價值。筆者認為，更多結合歷史、文學與心理的閱讀，應當可以豐富我們對諸多同類作品的理解，重新將這些文本的書寫層次與文學意味，彰顯出來。

（責任校對：朱芯儀）

也。」阮葵生，《茶餘客話》，上卷，頁 232。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宋〕歐陽修，〈洛陽牡丹記〉，收入歐陽修撰、李逸安點校，《歐陽修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
- 〔明〕王士性，《黔志》，收入《叢書集成初編》，第3182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據學海類編本排印。
- 〔明〕田汝成，《炎徼紀聞》，收入《叢書集成初編》，第3979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 〔明〕宋應星著，潘吉星譯注，《天工開物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 〔明〕郭子章，《黔記》，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貴州府縣志輯》，第2、3冊，成都：巴蜀書社，2006年。
- 〔明〕馮夢龍，《智囊》，收入《馮夢龍全集》，第10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
- 〔明〕楊慎，《滇程記》，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127冊，台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年。
- 〔清〕田雯，《古歡堂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138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 〔清〕田雯，《長河志籍考》，收入《叢書集成初編》，第3143、3144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 〔清〕田雯，《黔書》，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貴州府縣志輯》，第3冊，成都：巴蜀書社，2006年，民國《黔南叢書》據嘉慶十三年刻本重排鉛印本。
- 〔清〕李宗昉，《黔記》，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貴州府縣志輯》，第5冊，成都：巴蜀書社，2006年。
- 〔清〕阮葵生，《茶餘客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 〔清〕張澍，《續黔書》，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貴州府縣志輯》，第3冊，成都：巴蜀書社，2006年。
- 〔清〕陸次雲，《北墅緒言》，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237冊，台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
- 〔清〕鄂爾泰等修，《貴州通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貴州府縣志輯》，第4冊。成都：巴蜀書社，2006年。
- 〔清〕趙爾巽等，《清史稿》卷四百八十四，列傳二百七十一，文苑一，台北：明文書局，1985年。

二、近人論著

- 巴兆祥，《方志學新詮》，上海：學林出版社，2004年。
- 王鵬惠，〈漢人的異己想像與再現：明清時期滇黔類民族誌書寫的分析〉，《考古人類學刊》第58期，2002年6月。
- 田貴寶，〈清初著名文學家——田雯〉，《德城文史》第16輯，1999年8月。
- 李景華，〈清初詩壇和詩人田雯〉，《首都師範大學學報》，1994年第2期。
- 胡曉真，〈前には奢香有り後には良玉——明代西南女土司の女性民族英雄、構築されるそのイメージ〉，木下雅弘譯，《中國文學報》第78冊，2009年10月。
- 胡曉真，〈旅行、獵奇與考古——《滇黔土司婚禮記》中的禮學世界〉，《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29期，2006年9月。
- 胡曉真，〈華夏忠臣遭遇邊域保蟲——《蟬史》與《野叟曝言》中的西南書寫〉，《中國文學學報》第2期，2011年12月。
- 胡曉真，〈炎徼與我杭——田汝成的地方聞見〉，收入林玫儀主編，《文學經典的傳播與詮釋》，頁255-291。台北：中央研究院，2013年11月。

張銀娜，《田雯研究》，蘭州：蘭州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學科碩士論文，
2007年。

黃金元，〈清初山左詩人田雯及其詩歌創作〉，《東岳論叢》，2004年5
期。

劉聿鑫編，《馮惟敏、馮溥、李之芳、田雯、張篤慶、郝懿行、王懿
榮年譜》，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2年。

鄭方坤，〈古歡堂詩鈔小傳〉，《本朝名家詩鈔小傳》，第24冊，台北：
明文書局，1985年。

錢鍾書，《談藝錄》，香港：龍門書局，1965年。

Aesthetic Pursuit and Practical Information in *The Qian Account* 黔書

Siao-chen Hu*

Abstract

We can often detect in Ming-Qing texts related to China's southwest, notwithstanding their generic categories, mutually referential and competing discourses of history, legend, experience and imagination. In this paper I take *The Qian Account*《黔書》by Tian Wen 田雯, who served as the governor of the Guizhou province 貴州 in the early Qing, as an example to discuss how the values of practical information and aesthetic pursuit interact in the generic framework of a local gazetteer / reference book. The paper also argues that it is important to read *The Qian Account* in the context of Tian's writings, and compare it with his other works. In so doing we can unveil the suppressed cacophony of conflicts, anxieties and resentments which will greatly enrich our interpretation. As a writer, Tian always strived to be intricate, ornate and novel; therefore, his literary style contradicted the requirement of the "reference book for governance." It is precisely the contradiction, however, that has rendered *The Qian Account* a text of outstanding literary merit.

Key words: Tian Wen 田雯, *The Qian Account* (*Qian shu*) 黔書,
Collected Works of the Guhuan Hall (*Guhuan tang ji*) 古歡
堂集, China's southwest

* Research Fellow & Director,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Academia Sinica

